

深度报道研究

(代前言)

时统宇

深度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新闻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新闻界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深度报道表现出的规模宏大、纵横捭阖、超越时空、谈古论今的思辨力和穿透力，从相当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展示了 20 世纪中华民族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内涵和深度。研究深度报道的学理含义、时代背景、审美范畴、理论意义等问题，对于我们全面、科学、辩证地考察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的嬗变和发展，正确看待和判断 21 世纪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向，发挥不同媒介的优势并扬长避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新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些优秀深度报道为蓝本，在探讨这些作品历史内涵和历史深度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这些作品的写作特点。评介文章除署名外，均为本人撰写。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本书的开始处，我们先对深度报道的若干相关问题作一些必要的交待和分析。

第一节 深度报道学理层面的含义

深度报道是新闻传播活动深入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同时，深度报道也是受众对增大新闻传播的信息量和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深度报道呢？

《新闻学大词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进一步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深度报道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的模式，要求对新闻事实进行跨时空的、由里到外的综合反映。对‘时间’的采访应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采访地点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现场’延伸或波及到的地方；不仅要采访当事人，而且要采访其他有关人员；采访新闻事实时，一方面对事实本身的情形、细节要尽可能做详细采访，对相关的事实也应进行采访；应把主要精力放在 Why（原因）和 How（怎么样）上，说明来龙去脉，阐明本质意义，估计事件影响，揭示发展趋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3 页）

《宣传舆论学大词典》的解释是：“通过系统的背景材料和客观的解释、分析，全面深入地展示新闻内涵的一种报道形式。与一种动态报道相比，深度报道要求对新闻事实的表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从深度说，它不仅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新闻事件，而且还要阐明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内在规律及其重要意义；从广度说，它不仅要求报道事件本身，还要求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背景材料，对新闻的诸要素——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原因、结果，作必要的拓展和延伸。总之，它要求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观察和表现。”（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8 页）

在一些有关新闻写作的著述中，对深度报道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例如：“深度报道是一种以‘深’见长的新闻体裁。”（《新闻写作学》第 58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深度报道是一

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质,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深度报道与新闻思维》第7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美国新闻学家埃德温·埃莫里和迈克尔父子认为:“老式的客观报道,坚持对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情做纯事实报道,受到一种新的概念的挑战,后者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真正要讲新闻真实性的话,读者需要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美国新闻史》第490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另一位美国学者沃尔特·福克斯写道:在广播电视的时代,“记者只是简单地叙述发生了‘什么’事实,只是简单地交待传统报道中的五个W已不合时宜,而‘为什么’的问题突然成为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在电子时代,新闻报道中需要意义与背景,而提供这些内容的工作便获得一个特别的称谓:解释(interpretation)。”(《新闻写作》第1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深度报道本是西方新闻学的术语,在英文称之为 In-depth Reports。从历史上看,早在19世纪黄色新闻在美国泛滥之时,人们就不满于这种“没有灵魂”的新闻,从而出现了与之相对的深度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要求新闻媒介对战争的突然来临作出解释,对纯新闻已感到不满足。后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安、纷繁复杂,人们对深度报道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便是深度报道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深度报道的兴起还有一个信息传播技术层面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电子媒介向印刷媒介提出了不容置疑的挑战。以美国为例,“直到60年代,面对汹涌的电视浪潮而谋求生存之际,日报才开始在发表更能说明问题的新闻上进行严肃认真的尝试。这一尝试分为两途:一是报道新闻时注重读者兴趣,为他们从电视上已看到的新闻事件提供前因后果的背景分析;二是试图对新闻进行更吸引人、更带可视性的包装加工。”

(《新闻写作》第 15 页,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广播电视对报纸提出的挑战的意义就在于: 报纸必须在深度报道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只有这样才能在新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西方, 深度报道有多种提法, 有人将其称之为“大标题后报道”、“大报道”, 也有人认为深度报道就是解释性报道的一种形式。有人归纳了深度报道的六种形式: 解释性报道、事件性通讯、新闻分析、新闻综述、新闻故事(西方所谓的新闻小说)、特稿。还有的人认为, 深度报道在西方还包括预测性新闻、开拓性新闻、精确新闻等。西方学者将深度报道的特征概括为: “以今日之事态, 核对昨日的背景, 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新闻学大词典》第 154 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深度报道在我国也并不陌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 为了适应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 在新闻写作中就有了字数较多、夹叙夹议的长篇新闻和对同一类事件经过分析后进行的综合报道。周恩来同志早在 1921 年当深度报道在西方报纸上流行之初, 就提倡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溯其根源, 求其真相, 判其出路”, 他认为: “现象一日千变, 简单之消息, 每与前后矛盾, 缺乏有系统之排列及有条理之叙述, 故长篇通讯终不可少也。”

随着我国新闻界深度报道热的出现, 从 80 年代后期起, 深度报道引起了我国新闻理论界的浓厚兴趣, 有关深度报道的研究从未中断。从学理的层面上说, 深度报道是我国报纸新闻的再次调整, 在传播手段现代化的意义上, 深度报道是报纸扬长避短, 与广播电视相抗衡的有力武器; 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 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的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识、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

第二节 中国深度报道崛起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在 80 年代中后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深度报道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产生了一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能够代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优秀深度报道作品。那么，这一可喜的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37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中国报纸上深度报道的一度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集中地反映了新闻传播与新闻接受的一种内在的供求关系。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哪个更大，哪个更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 80 年代中期的电视剧《雪城》的插曲，在当时风靡了大江南北。而在现实生活中，一问三不知的问题也确实太多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 80 年代中后期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资倒挂、经商成风、知识贬值等等，都有着切肤之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困惑着人们。“巨龙要腾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对此，新闻应该做出回答，新闻必须做出回答。

过时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解体乃至崩溃，为新闻的社会反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又十分急促地呼唤着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功能。很明显，新闻媒介上披露的事实，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身边也照样有。特别是到了 80 年代的后期，物价到处都在涨，“读书无用论”到处都在抬头，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有股经商热……对新闻报道的不足为奇和无动于衷，可以说是国民的一种普通心态。一句话，人们关注的不仅是

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中回答了什么。深度报道的方兴未艾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厚的社会土壤。

从 1986 年开始，全国好新闻评选设立了深度报道这一奖项。当年，《长江漂流系列报道》和《遗弃女婴事件连续报道》获得了深度报道的两个一等奖。不用问内容，一看它们的标题就知道这样的深度报道是以某件突发性事件为主体，深在新闻的社会反映和道德力量上。而到了第二年——1987 年，《关广梅现象》获报纸系统惟一的一个特等奖，并且，《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首都新闻单位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被破例授予特等奖。这几篇新闻报道的突出特点，是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社会反映，而是充满了全新的社会认识。《关广梅现象》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词汇；《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更没有什么新闻事件而言；中国青年报有关大兴安岭的“三色”报道也没有着重渲染火灾的惨烈。传统新闻观念中强调事件的突发、爆炸、惊人等定理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了。

因此，从社会宏观的角度看，我国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1992 年以后开始正式提出市场经济）的转变，预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新闻在这一转变中，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终于在社会事件和社会心理的重大演变中，脱颖而出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深度报道。

1987 年，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为是“深度报道年”。“1987 年的新闻改革，本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但它在新闻改革的历史上恐怕仍是重要的一页。今天我们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见那个沉闷的上半年和那个开朗的下半年”。（《新闻战线》1988 年第 4 期，第 11 页）那一年，以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报道为契机，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使人耳目一新。之后，经济日报开展了“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一时间，

“关广梅现象”成了评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性质的一个代表性的词汇，对凡事先问姓“社”姓“资”的正视和重新审视，其内在含义已远远超出了新闻传播的范围。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长期禁锢人们的“左”的枷锁，“关广梅现象”的报纸大讨论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人民日报推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的长达三万字的深度报道，此篇被认为是深度报道的代表之作，成为“深度报道年”里最令人激动的篇章。在这前后，《命运备忘录》、《七届人大开幕前夕》、《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放活”教授》等等，以首都几家大报为代表，竞相发表的长篇文章构成了一股势头很大的深度报道热流，冲击着社会，冲击着记者，也冲击着原有的新闻写作模式和新闻工作者的思维。在1987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关广梅现象》被评为报纸系统惟一的特等奖，《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大兴安岭的火灾报道被授予特别奖。

回顾我国的新闻史，深度报道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时务文体”，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传世之作，都在相当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触摸着社会脉搏的跳动。可以说，新闻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简单地仅仅根据它的篇幅长短而定，关键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尽管深度报道一词源于西方，但中国的此类报道决不逊于西方。深度报道作为我国新闻写作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写作高峰的出现和代表作的问世，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深度报道的忧患意识。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这种意识是属于美学范畴的。梁启超的时代，八国联军打来了，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范长江的时代，东洋鬼子打来了，烧杀抢掠，中华民族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今天，我们若不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我们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振兴的时代，足以使当代记者获得感奋和清醒。是否可以这样说，每当中华民族开始

警醒起来时,就会有一批振聋发聩的深度报道应运而生。

于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深度报道正像有的记者说的那样,要担负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功能,要有一种民族振兴时代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于是,人们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的与世界的横向比较;看到了《西部地区贫困探源》中商品经济匮乏造成的愚昧与洪荒;看到了报道大兴安岭火灾中对“悲剧当做喜剧报”的有力冲击……在改革中,在开放中,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看中国,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从我们自身进行深刻反省,这既是对我国深度报道传统的回归,又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发展。

就新闻作品自身而言,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祖先面前“高山仰止”。一味仿造前人的作品,只能是让前人把着我们的手去照葫芦画瓢。人类审美意识的流变尽管会在历史长河中出现小的反复,但永远不会回复到原来的地步,当代中国新闻界应该拿出自己的新东西来反映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在此,深度报道颇有担当此任的势头。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超越时空、谈古论今,构成了深度报道崛起时的一种鲜明的特征,这正是人类审美进程中,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审美超越。对此,有人称之为“全息组合”,有人称之为“全方位把握”,有人称之为中国新闻界“学者型记者”的出现。无论如何,从美学的角度看,深度报道具有新闻审美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我国新闻写作发展中新的生长点,这的确不能等闲视之。

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

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本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开辟了广阔报道空间。就在深度报道的高峰时期，1987年至1988年，先后召开了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共十三大、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三次会议一次比一次提高的开放程度，不仅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赏，而且也为新闻改革的新的突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兴起，首先并不是新闻体裁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在新闻领域的现实成果。无论怎样看待和评价深度报道，都不能离开改革开放这个大气候。耐人寻味的更在于，在深度报道的兴起和发展中，其佳作的涉猎范围，几乎都在改革开放的疆域之内，离开了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和大背景，深度报道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给新闻界注入了新血，催动了新闻改革的涌动。

第三节 深度报道的审美优势与审美缺陷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蕴涵了巨大的社会美，中华民族在结束了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后，开始了民族的全面复兴，改革就是全民族的喜剧。在改革开放这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全方位的新闻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常见的消息、通讯等体裁已不能容纳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记者的思考，几百字的篇幅也好像有些碍手碍脚，原有的新闻模式跑不开马了。

报纸深度报道具有书面文本的特点，在报纸有限的空间里也要写出“经史子集”的方方面面。于是，深度报道中写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一篇论及九年的风雨历程；写乡镇企业，可以在历史变迁的回顾中，凝练为一篇专业史；写农村经济改革，可以指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走出报道单一事件的模

式的局限，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在新闻中融进一种统摄全局的历史意识，这是 80 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深度报道所共有的一个特点。

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和笔触，是当年深度报道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到处莺歌燕舞”的一味赞美已不见踪影，留下来的是改革阵痛中的深刻思考。

请看同世界进行科学的横向比较：“我们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东欧相比，大约只是其 1/7 至 1/15。”“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其 1/3，人均可利用草原只占其 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其 13%。如果我们不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新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人民日报》1987 年 10 月 6 日）科学的比较可以比出民族的自信心，比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性，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请看敢于触及某个新闻事件中所反映的社会深层弊端：轻工部劣质产品展销会名存实亡后，“劣展风波仅仅是改革中出现的小插曲，然而透过它，却能看到新旧两种体制在交替过程中的摩擦：新生事物出现时，传统的观念，固执的经验，守旧的势力会一齐跳出来，戴着新面纱与你搏斗，直至你失去锋芒。”（《经济日报》1987 年 12 月 19 日）

再请看直面新闻界自身的阴暗面：“两年前全国总工会的调查表明，总共只有 66% 的读者认为我们的报道‘生动活泼，言之有物’。还有另一个参照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专业和业余报道队伍，’一位老记者对我们说：‘然而我们这个拥有 1/4 人类的国家在世界新闻网络中究竟占有多大份额’？”（《中国青年报》1988 年 1 月 9 日）

类似我们列举的上述段落，在许多深度报道里俯拾皆是，渗透在其中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令人感奋和惊醒。深度报道既能以情感称胜，又可以以哲理见长；即有重于当代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有偏于历史经验的回溯思考。读者从中得到的审美意趣可以随之转化为一种审美净化，从审美的角度俯视我们这个时代。

就人类的任何精神产品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是其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在作品中透露出—个时代的风云，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中外文学发展史最能表现出这种特点，《悲惨世界》、《复活》、《红楼梦》等，均无例外。至于作为我们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则更是批判的、革命的。深度报道在崛起时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之尖锐，社会触角之敏锐，社会涵盖之广泛，社会反响之强烈，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万花筒，组成了一曲气势浑厚的改革乐章，大有在新闻作品中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势头。

长篇的深度报道尽管在形式上有悖于新闻要短的信条，但其中许多深度报道的社会效果却又出人意料得好，这不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困惑：新闻写作中的短与长的尺度，到底应该如何把握，长篇深度报道的特定的审美价值何在？

谈到这个问题，使人想起了诗人苏东坡。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其壮美流溢古今。而他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也以其优美成为词坛上的一颗明珠。看来，虽然美的定义是个“千古之谜”，但在形式上美无定势和模式却是确定不疑的。新闻写作的发展也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视野的扩大，在新闻实践中创造出不断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新的新闻文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们再看深度报道中的记者。

新闻表现方式的改变，首先是记者思维方式的改变，深度报道的风靡一时，也应运而生了许多崭新的新闻观念。“新闻的采

写，首先是新闻记者的一种选择。”“新闻作品不是光要有宣传、解释和鼓动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担负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功能。”当代中青年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深度报道崛起的主观条件。

布票，久违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十七八年前，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時候，每天放学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从妈妈的包里拿从各种票证，去商店排队。什么肉票、鱼票、肥皂票、火柴票、苏打票、酱油票……应有尽有，见队就排，一手交票，一手购物。可以说，我们是伴随票证长大的一代。

猛一看，这是新闻语言吗？是的，一点没错，而且是《经济日报》一篇题为《票证的变迁》的深度报道的开头。记者的笔触大概不那么纯客观，但这分明是凝聚了他们思考的结晶，这里有记者鲜明的主体意识。

“伴随票证长大的一代”，很形象地说明了深度报道大行其道时的中青年记者人生轨迹的一个侧面，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和历史曲折，有着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代价，他们的人生道路曾被浓雾所遮断。

然而这就是他们的财富，一笔哪一代人都无法得到的财富。十年浩劫，十年空白，却给了这批青年人提供了历史的空间。当他们步入新闻大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了历史的机会，他们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以及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重建了过去的历史。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伴随着民族的觉醒顺理成章地属于他们。“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文艺复兴时期的先锋莎士比亚发自生命的呼唤，在这一代记者身上，又一次获得了崇高的人性美和人格美。

“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是又一代记者的全新的认识。寻求新闻的生活气息，必然是对新闻表现形式的创新。因而，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审美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

推出作品与推出人才是一致的，记者主体意识的高扬，必然是个人写作风格的形成。

记者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审美主体，记者的这种观察与思考，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表层，而应当在多种心理功能的共同作用和相互调节中，表达出对事实的一种特定态度和超越性本质。只有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深度的审美体验，才能使读者从新闻中获得情感共鸣和心理同构。深度报道融事实与记者的思考与一体，在作品中将宏大的历史画面进行纵横的剪辑，同时也将记者的感受、比较乃至困惑，真诚地留给读者，那种现代人的眼光、立场及特有的感觉方式，正是一种深度的美学思考。

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创作了深度报道的记者身上洋溢着的一种理性美。如同一切真正的艺术创造者都有着富有的内涵一样，新闻记者的这种内涵又必然沉淀着理性素养，这其中包括经过记者个性选择的新闻理论。据《中国青年报》的同志讲，他们的记者有一种读书热，在繁忙的新闻采写之余，他们常常争相阅读一些国内外最新观点的书，这种知识上的不断更新和充实，对新闻作品的良好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而，该报的一些深度报道事实精当，议论也精彩，那种浓厚的理论兴趣，那种生怕自己知识陈旧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记者理性思维的一种巩固和深化。

记者是小史家，史家是大记者。记者的史家气派和风格是中国记者的光荣传统，当代中国记者确有史家气派。

我们在对深度报道的审美优势予以充分肯定的时候，也应当明确地指出它的审美缺陷。

首先，报纸终究是新闻纸，杂志化毕竟不是报纸的发展方向，报纸上黑压压的大块文章连篇累牍，乃至“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手法势必会淡化报纸的新闻性。深度报道在一个时期的大量出现，只能视其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现象，报纸动辄半个版、8000字，经常让深度报道占领版面，此举不宜视作报纸的发展方向。新闻的种种既定属性，应视为报纸的美学限定，“真、短、快、活、强”尽管无法包容深度报道的优势，但其自身也不能说相形见绌。用尽可能小的空间去提供最新最快的信息，是新闻写作和报纸发展的根本目标。

其次，深度报道的主观色彩太浓和感情渲染过重，是深度报道发展的严重障碍，缺少新闻味，淡化时效性更不是深度报道的发展方向。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审美的本质特征，“事实不够，议论来凑”必然会带来新闻写作的新的困境。新闻的深刻归根到底是事实的深刻，用一连串概念去启发人的思维不是新闻的任务，新闻作品的“亚哲学”思辨不宜太多。

另外，任何事物多则滥，多则平庸，在记者中，撰写深度报道不可出现“攀比现象”，你一篇，我也一篇，谁也不示弱，如此下去，报纸将不堪重负。须知，不是任何题材都能变为深度报道，也不是每个记者都能驾驭深度报道，“一窝蜂”、“大呼隆”的弊端应该时刻予以警惕。有的深度报道给人以一种写得很勉强感觉，既不像通讯，更与报告文学相距甚远，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与记者的采访不深入、缺乏大量的感性材料有关，其结果只能是深度报道的审美价值的贫弱。

第四节 深度报道若干问题的理论辨析

深度报道给新闻研究者带来的兴趣，似乎并不亚于记者在深度报道中的潜心经营。从一些颇有建树的学者，到某些鲜为人知的研究新兵，都在自己的涉猎范围内，对深度报道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可以说，对深度报道的研究是中国新闻界自身的一个“热点”。1989年，我曾参加了全国好新闻深度报道组的评选工作，在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亲历，谈谈对深度报道的若干理论问题的看法。

1 深度报道是理论的产物还是实践的结晶

这似乎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同时我们又被那个荒唐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所困扰，这就是究竟是先有了有关深度报道的超前性理论，还是深度报道的实践发展为其理论产生准备了条件；是深度报道的理论预先规定了深度报道的表现模式，还是深度报道的实践为其理论提供了典型的例证。因为，我们多见有关深度报道中这样的研究思路：一种是“古已有之”式，即国人是怎样有先见之明的，外国人又是如何发端于某时之后的。二是“总结归纳”式，即深度报道在写作上大约有多少种类型，仿佛深度报道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这些“式”或“型”。于是，人们难免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这就是深度报道早已有了先进的理论，而今天中国深度报道的现状不过是“古已有之”的产物和沿革，一句话，深度报道的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早就很发达了，过去人们之所以不知深度报道为何物，是因为新闻实践掉了队。

我以为，以上所举若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其走进误区之处在于近乎学究地评价深度报道，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倾听新闻实践的呼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

最终的经济根源。从社会大背景上来说,深度报道在中国传播媒介中的崛起,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正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推动下,新闻报道才有了向深度开拓的可能。全国好新闻评选作为对新闻界的优秀作品的一次检阅,从1987年开始增设深度报道评选项目,其缘由也决非是什么理论的产物,而是深度报道实践的呼唤和推动。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深度报道的发展颇能印证此说。1986年,首次在全国好新闻深度报道中入选的是《长江漂流系列报道》和《遗弃女婴事件连续报道》,这很明显地以有关事件性和社会道德为题材而入围的。随后的1987年,《关广梅现象》即以其崭新的思维和写作方式以及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大讨论而荣获特等奖。无论是就《关广梅现象》的社会意义来说还是就新闻价值而言,在理论上的是非尚处在混沌状态时,首先是这一现象就有了,就得以新闻披露了,新闻实践就走在前面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深度报道的获奖作品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像一等奖中的《武威收报事件》、《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系列报道》,即是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决策民主化为基本着眼点,抓住了舆论中的“热点”、“难点”、“敏感点”,显示了新闻作品无可替代的作用。平心而论,深度报道的这种大步前进是人们想不到的,也是理论所始料未及的。深度报道的一系列实践,都是中外原有的理论所很难涵盖和解释的,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

因此,全国好新闻评委会将系列报道、组合报道、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参评的三种形式,是根据新闻实践的发展而定的,如果说它有什么理论依据的话,我以为,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就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2 深度报道最可贵的品格是思辨的深刻还是事实的深刻

在 1988 年全国好新闻的学术讨论会上，如何评价深度报道中的思辨成份，成为与会者的一个重要话题。问题的焦点是，深度报道是深在事实还是深在思辨。

的确，深度报道中的理性思辨是新闻写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生长点，在许多深度报道作品中，理性思辨成份对于烘托和深化新闻主题，进一步强化新闻的社会意义，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民族需要探索，需要思考，新闻的浮光掠影是难以完成其神圣的使命的。

但是，新闻终究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同样是深度报道所不能违背的，深度报道最根本的深刻在于事实，而其中的思辨色彩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不可否认，新思想的传播也是新闻，但新闻的思想性必须是基于它所依据的事实才能有所附丽，单纯的思辨说理更多的不属于新闻，缺乏深度的小事情也难以承担起社会思辨的载体重任。

事实上，深度报道的报道深度关键在于“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种人民的知道和讨论就是一种最深刻的东西。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到今天，让人民知道仍然是首要问题，而且记者在写作中表露出的思考，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深度报道中的“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决不能变成“记者的议论”。如果说，我们仍然思考的不够，那么，首先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需要故作高深和“玩儿深沉”。

1988 年全国好新闻深度报道的四个一等奖中，一家鲜为人知的小报《江苏工人报》拔去一个。这家报纸发表的《南京特价商店的连续报道》率先抨击了变相乱涨价的具体行为，对矫正领导机关的错误决策，抑制乱涨价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最可贵的新闻品格仍然在于事实本身而不是什么思辨，从某种意义